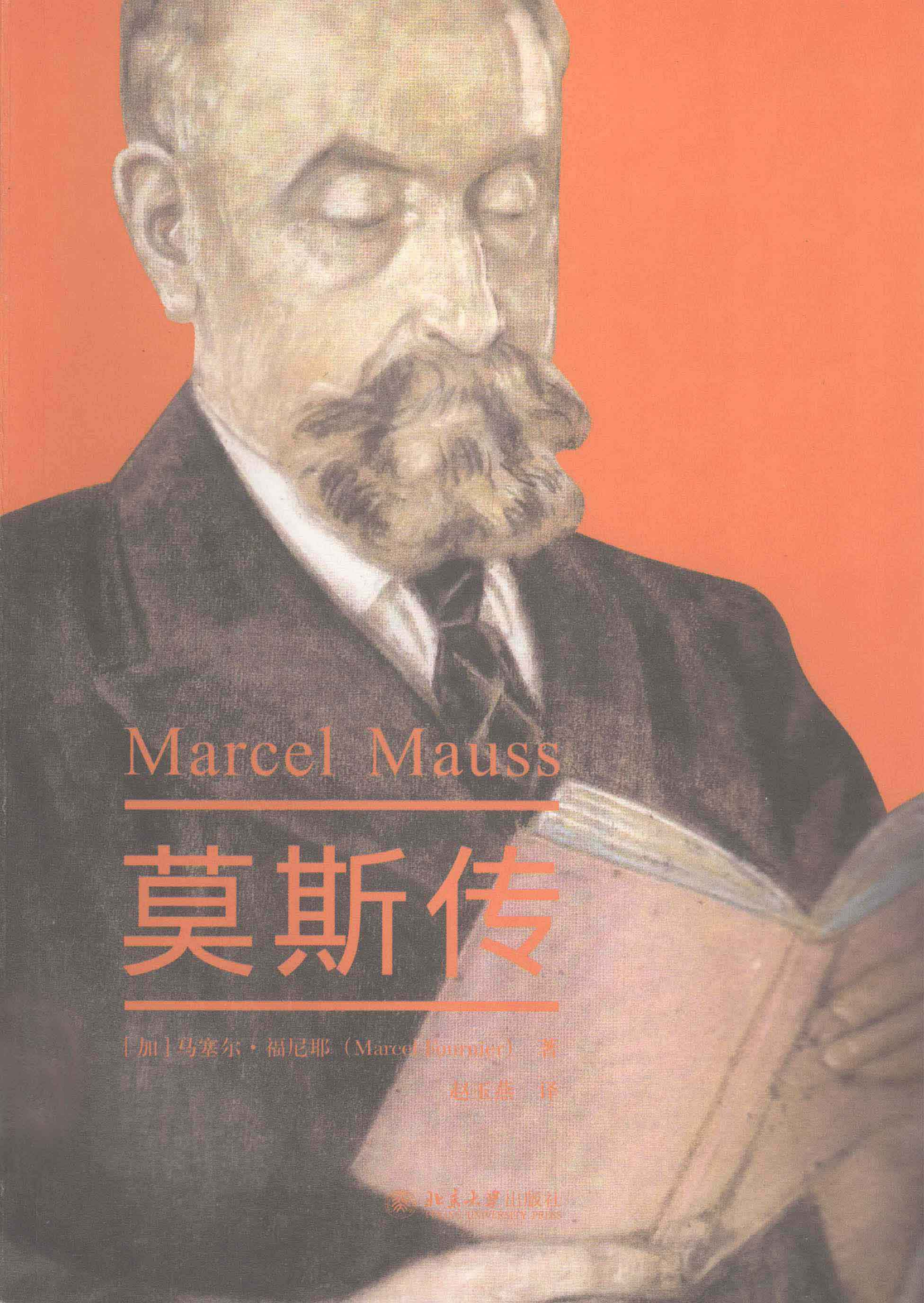


A portrait of Marcel Mauss, a French sociologist, depicted as an older man with a thick, dark mustache and closed eyes,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tie. He is holding an open book in his hands.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orange color.

Marcel Mauss

莫斯传

[加]马塞尔·福尼耶 (Marcel Fournier) 著

赵玉燕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莫斯传

Marcel Mauss

[加] 马塞尔·福尼耶 著 赵玉燕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5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传/(加)马塞尔·福尼耶(Marcel Fournier)著;赵玉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

(未名传记图书馆·人类学家传记)

ISBN 978-7-301-21692-7

I. ①莫… II. ①福… ②赵… III. ①莫斯, M. (1872 ~ 1950) IV. ①K856.5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4969号

《Marcel Mauss》de Marcel Fournier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EME FAYAD, 1994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法国FAYAD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莫斯传

著作责任者: [加]马塞尔·福尼耶 著 赵玉燕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692-7/C·08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9.75印张 450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人类学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知识群体。他们在全世界行走，当然更多的是行走在异国他乡，到最偏远的地方居留，能讲当地人的语言，知道怎样融入陌生人群而掏出他们的心里话，获解他们的地方知识。他们把所见所闻、所历所感铺排成篇，挥洒成文，作为一种文化呈现给自己的社会，呈现给心中所勾画的一个互相理解的未来世界。

* * * * *

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此中差别，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因为有人类学家群体的参与，不同人群的心理距离极大地被拉近，地球才在感知上缩小为一个“村”。

今天的我们与我们的太爷爷辈在长相上仍然颇为相似，但在观念的构成上肯定非常不同。今天的我们与地球其他角落的人群在体质上颇为不同，但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却颇有共同之处。此中变化，当然也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

人类学家是现代社会的魔法师，或者说，人类学的知识在现代社会发挥了魔法一般的作用。一个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十分遥远的世界，被人类学家的专业知识拉得很近。对于异国，对于异族，不仅是中国古人才有山海经式的想象。每个民族自然都曾经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但是，自从人类学作为一种专业在近百年前形成以来，那么多民族志文本、民族志电影把远方异民族的生活

情景“搬到”各个社会，“呈现”在人们的客厅、书桌、床头，逐渐把一个民族之间充满隔阂、疏远、偏见的世界，微缩为相互颇有了解、分担大量共享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尽管人类仍然充满民族问题，但是人类社会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进路上，无疑已经走近第三个阶段。人类的这个历史进步要归功于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人类学家群体的贡献最为卓著。恰恰是人类学家掌握着改变人们的异族偏见的魔法。人类学家发挥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从创造超越成见、解放异端的知识条件开始的。

人类学家让自己的社会对他人社会感兴趣，无论是借奇风异俗（夸富宴、库拉交换，礼物之豪，斗鸡，割礼）说事，还是从日常生活着眼，归根结底要把他人引入自己的社会，一方面固然是要引导人们发现他人社会的优点，反思自己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要让自己的社会学习如何把他人和我群当做同类来思考，并最终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思考。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宏愿，也只有在学界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经验性地思考的条件下才是现实。

人类学家与现代世界或者世界的现代性是共生的。传统时代的特征是小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小共同体之间因为差异而对立。世界的现代进程却是给小共同体注入多样性，给差异的共同体增加共同性。在同质性强的社群之内造就文化的丰富选择，在差异、对立的社群之间造就文化共享。

现代社会因为人类学家而不同，因为人类学家的积极参与而更美好。

* * * * *

读人类学家的大作，我们会十分崇拜人类学家的智慧、学识，以及呈现异文化的大德大能。但是，当人类学家的传记把我们带到人类学家的工作现场，带到人类学家的情感世界，人类学家的职业活动和个人生活都一并摆在眼前，我们对人类学家作为学人和作为普通人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表现出的人的两面性，也就有了某种身临其境的体认。

人类学家在异国他乡的调查现场总是纠结着复杂的情感：临近进入的兴奋与长时间工作形成的焦虑、融入其中的喜悦与作为外来者的孤独、有所得时的

满足与挫折造成的消沉，总是如影随形。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情感历程，无一例外是过山车的体验。这是他们个人的经历，这却也是人类不同民族相遇相处的心理的一种表征。人作为个人的内心总是孤独的，但是人能够结成社群过某种社会性的生活。这之中的关键或驱力是，人对同类感兴趣。人类学家把人类的孤独体验到了极致，也把人类寻找与他人共处的努力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无论在人性的体验上，还是在解决人性缺陷的不懈努力上，人类学家的经历都最好地诠释了那个时代真正“属人的生活”。

不辱使命的人类学家在智商和情商上都是不同寻常的人，这样一种人一代代地聚成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构成人类知识生产中一道魅力无限的风光。喜欢把梦想寄托在远方的年轻人，很容易在人生的一个时期迷恋人类学；总在心里为“新异”留一个角落的学人，很容易一生都留意人类学的新成果。人类学是因为人类学家而引人入胜。在知识生产的竞技场上，大多数学科都是在体育场、体育馆里比赛，人类学家却总是跑一个人的马拉松——他们一个人跑得很远，最后才回到体育场接受公众掌声的慰勉。所以，很多人喜欢人类学，然而总是只有少数年轻人会下决心，把自己的求知之志献给并没有跑道的这项特殊的马拉松。惟其如此，人类学总是一个很少数的特殊知识群体所从事的学业。

高丙中

2011年9月25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部分 涂尔干的外甥 7

第一章 埃皮纳勒、波尔多、巴黎 9

第二章 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学生 41

第三章 制度礼仪：早期作品与海外旅行 62

第二部分 图腾和禁忌氏族 91

第四章 在同伙中 95

第五章 公民莫斯 107

第六章 圣-雅克大街 126

第七章 《人道报》的记者 136

第八章 集体疯狂 148

第九章 法兰西学院的一场激战：洛瓦西事件 166

第十章 不可笑的战争 187

第三部分 继承人 207

第十一章 （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生活仍在继续 211

第十二章 繁重的遗产 239

第十三章 民族学研究所 260

第十四章 社会学，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274

第四部分 认可 289

第十五章 法兰西学院的职位 292

第十六章 教授们唇枪舌战之地 307

第十七章 足以让你对政治绝望 338

第十八章 神话时代 351

后 记 战争岁月及战后岁月 371

注 释 392

引言

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深受敬仰。贡多米纳斯 (Georges Condominas) 称其为“法国民族学之父”^[1]。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指出,《礼物》这部人类学学生必读的作品,是他“最理所当然的著名作品”^[2]。用居尔维什 (Georges Gurvitch) 的话来讲,它是一部“真正的杰作”^[3]。

这位长久以来不被人类学家之外的人们所重视的伟大学者所传下来的学术遗产,现在正被学术共同体所欣赏。《社会学与人类学》杂志在 1950 年搜集出版了半打莫斯的作品,也就是在这一年,莫斯辞世。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法兰西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名为《莫斯》的作品选集^[4];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年里,米纽伊特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卷本作品集^[5]。然而,收录在这一作品集中的仅仅是他的学术作品。莫斯的许多政治作品,就像登尼斯·奥利耶 (Denis Hollier) 所惋惜的那样^[6],曾经极为分散于各处,但它们最近也被收集整理了。

亨利·莱维-布吕尔 (Henri Lévy-Bruhl) 用几句话概括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这位身兼其教师及朋友角色的人的本性:“莫斯首先是一位民族学家和宗教史学家”;“莫斯摒弃一切教条主义”;“莫斯无所不知”;“莫斯总有洞见充盈”;“莫斯是奉献精神的典型象征”;“莫斯从不流于泛泛空谈”。跳过几行之后,他追忆起莫斯“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的面容”;“体型高大,身材魁梧,留着浅棕色的络腮胡须;样貌普通,犀利、明亮的双眸。他的谈话充满智慧,虽然嗓音有些空洞,说话慢悠悠的。话里经常有些悖论,有时连他自己都会被绕进去”。^[7]

莱维-布吕尔对莫斯的私生活守口如瓶：“他过着一个学者的生活，没什么突出特点。”^[8]但他马上又补充道：“这不是我们议论他的场所。他的朋友和爱人会永远怀念他伟大的仁慈、体贴和温柔……然而，我们可以说，他的好心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他的学术产出。”^[9]我们对莫斯所知甚少，虽然也有少数关于他的简短传记，但他从来没有成为一本学术传记真正的主角。^[10]

为一位科学家写学术传记，不仅要聚焦于他的个性——一系列能力、习惯、性情和体力、智力上的长处^[11]——而且要写出与他有关的学科（在我们这个例子中，指的是宗教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和人们的历史。此外，如莫斯以前的学生安德烈-乔治·奥迪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所提议的，我们应将其作品置于学科语境中。^[12]这一工程，如果我们想完成的话，不说是危险重重，至少也可谓是雄心勃勃。这也是莫斯自己构想出来的一个愿望。莫斯在为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写讣告时写道：“一件艺术作品可能仅是提示性的。然而，一位科学家的历史，必须真实。有关于他的一切，都应涉及。”^[13]

当我们将目光从莫斯的身上移开，瞄向他所处的环境和年代时，我们对莫斯的生活会兴趣倍增。其时新的学科（民族学和社会学）以及新的思想流派：涂尔干学派正在形成；横跨1872—1950年的漫长时期中，两次标志性的主要战争先后爆发。通过写作、教学和政治行动，莫斯发现自己处于欧洲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活的中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处在“巫婆的大锅里”。

我们一旦提到莫斯，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舅舅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法国社会学派的带头人。^[14]莫斯自己也承认，将他和这一学派的工作分开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它有任何特点的话，那就是它将其浸没在刻意的非个人化中。基本上，作为一个团队，学派的意义在于合作，而非孤立和对独创性的矫饰追求，这或许是我科学生涯的特点。”^[15]

同其他参与到编写《社会学年鉴》这一伟大集体冒险中的人相比，莫斯更好地体现了这一研究特点的准则。他所有的科学生命都围绕着这本杂志而展开，他大量的著述都以笔记、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存在。关于这一围绕着涂尔干的青

年研究者团队（该团体常被人们描绘成个人崇拜团体）中的动力学状况，我们所知不多。不过，莫斯的个人档案，尤其是他的通信往来，为我们清楚明白地呈现了这一人文学科发展奠基时期所发生的事情。^[16]

通过检视莫斯与相关人员的意见交流、辩论和观点差异，我们也许能更精确地描绘涂尔干学派，呈现每个成员的特殊贡献。事实上，和其他人相比，莫斯发现自己处于依赖的位置上，就像贡多米纳斯所说，“待在涂尔干的阴影里”^[17]。他的著作，尤其是早期作品，看起来是“社会学派所完成的集体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8]。但当我们把莫斯的作品，包括其没有发表的文章，当成一个整体来阅读时，我们有资格去断言他的正统性：尽管这名外甥总是自称为涂尔干的追随者，但他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跟随。

莫斯对发展系统理论兴趣甚少，他宁愿“仅就手头材料进行分析”，以此提出几条有效的概括，之后“去干其他事情”。^[19]一如涂尔干，莫斯也是实证科学的一个坚定捍卫者，仅相信**事实本身**。他秉持进化论历史观，认为这一观点对社会事实的初级（或者说原始）形式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他致力于去分析各种制度的社会功能和研究社会整合的机制。通过研究宗教生活中的仪式表征，他对神圣理论的提出作出了一份贡献。他意识到，“社会生活最核心的源泉，就是一整套表征（representations）”；他参与了以研究“人类心态”为旨趣的涂尔干式社会学的广阔事业。

然而，我们很难轻易地将莫斯划入某个单一类别。他从一个学科转向另一个学科，对大量问题感兴趣，虽然步其舅舅之后尘，却谨慎地设法将自己与其区别开来。莫斯承认社会建立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但他相信社会还有赖于互惠才能延续。虽然社会秩序的维持要求共识（consensus），但它也取决于不同社会团体间的相互贯通。

莫斯作为外甥、门徒和继承者的身份有一个好处：他没有被迫去引导主要的纷争，虽然不乏学术界的对手。他能让自己与从前的论战对手，尤其是心理学家，保持对话姿态，尝试妥协。他更有兴趣拓宽知识而非捍卫教条，而他对科学的态度：总是既带有理性主义又伴有实证主义，更像是一个想通过收集新

材料来减少对事实的无知状态，同时又知道自己的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的研究者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想将已经条条框框化的知识整体灌输给学生的教授的态度。他乐于提醒我们，“未知的东西应该被揭示”。尽管莫斯从来没有做过田野工作，但他关注现实，对民族志研究非常熟悉。

仅将莫斯视为涂尔干学术遗产的继承人，是一种曲解。一战后，编辑涂尔干及其合作者那些先前未发表的论述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与此同时，他也追求自己在每一个领域方向的研究，从“身体技术”到“文明”概念与人的观念。尽管他出于纪念涂尔干的义务重新发动了《社会学年鉴》，但他于1925年协助创办的民族学研究所，却并非一宗涂尔干式的事业。

我们努力尝试在莫斯的作品中去发现能够使其成为一体的原则。维克多·卡拉迪 (Victor Karady) 认为，莫斯的作品合在一起看更像是“偶然发生”的结果，而“并非一项富于创意的工程的逻辑论证及其实现”。^[20] 这一评断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因为它认为一项创意工程的实现与环境无关。然而，莫斯确实常常面临极度的考验，例如，涂尔干、亨利·于贝尔 (Henri Hubert) 的死及他自身的病，并背负许多专业责任和个人义务。结果就是，他留下了几项未竟的工程：一篇关于祈祷的论文、一篇关于国族的杰作、一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小书和一项有关技艺的研究。

这一致力于科学研究并以礼物的精神为标志的生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莫里斯·莱纳特 (Maurice Leenhardt) 简洁地答道：“为数不多的几本书，散布各处的一些论文，影响深远。”^[21] 作为一位老师，他是学生非常亲近的人，但他更主要的身份则是一个向导、同伴和激励者。终其一生，在他内心深处，他都把自己当成一名学生。在事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甚至想当他学生的学生。“莫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人物，”让·卡泽纳夫 (Jean Cazeneuve) 说道，“他身上总是有一种年轻的、有点儿玩世不恭的神情。哪怕是作为一名教师，他似乎仍然一直隐秘地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学生模样。”^[22]

莫斯首先是一名学者，但他是一位对周边发生的一切从未失去过兴趣的学者。和他舅舅不一样，莫斯从进入大学就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作为集体主

义学生群体、法国工人党及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的成员，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他支持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他身兼《社会变迁》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撰稿人及《人道报》的记者，还在《民众》和《社会党人》上发表文章。我们对政治参与在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所参与的合作社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知之甚少。莫斯有能力参与国家职务竞选，但他更乐意仅作为一名斗士，忠于他的信仰和朋友，专心致志于适应新的现实情况。

我们揣测，这种政治参与影响了他的著述：一战后，莫斯就暴力这一议题写了长篇系列文章，发表了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学鉴析》的重要论文，开始着手写作一本有关国族的论著。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他为《社会学年鉴》杂志写出了《礼物》一文。这篇文章不仅证实了他作为一名民族学和宗教历史学专家的研究兴趣，也体现了一位参与政治的学者的敏锐性。作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犹太斗士，莫斯感觉到了他所处的位置和周边环境之间的矛盾。他对一战、俄国革命、国族、纳粹主义和其他事物的思考，是一名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如何去引导左派穿过风雨的人的思考。在阅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学鉴析》中，我们把握到了他的思想力量，他从人类世界最大的悲剧中概括出最直接的政治和道德结论的能力。

这项研究刚开始时，我和同事讨论了我打算写作莫斯学术史这一计划。同事们有些反应很积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还没人做过！”但是最常见的反应则证实了某种怀疑——“那可不是件容易事”，他们警告说。

他们说得很对。开展这项工作要求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同时具备的几个有利条件使这一点成为可能：我申请到了研究基金，得到了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邀请；与莫斯的家庭成员及与莫斯有私交的人的合作，使我大受裨益；法兰西学院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阿居隆（Maurice Agulhon）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还与于贝尔－莫斯收藏馆有过接触，这是完成本书必需的一个条件。于贝尔和莫斯的家人存放于法兰西学院档案馆的文件档案，对于任何对法国社会学流派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信

息源。它们包括涂尔干和莫斯的通讯来往信件、莫斯收到的一组信件、手稿（有些未曾发表）、莫斯的上课笔记和讲课教案、他的读书笔记，以及与《社会学年鉴》、法国社会学研究院和《社会学年鉴 II》有关的各种文件。

虽然这些信件打开了数不清的渠道，我仍需查阅其他档案，访谈莫斯的侄甥、侄甥女和他的学生，就他的政论文制作详细完整的目录来拓宽我的调查。许多不同的人，尤其是莫斯的家人慷慨给予我的支持与善意，不仅使我深为感激，并对我能完成这一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伟人的外形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仁慈、富有思想的人所具有的丰富且复杂的个性。^[23]当我们想到，用亨利·莱维-布吕尔的话来讲，这一个性是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基座”，承载着降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的涂尔干的外甥从一个地方到进入法兰西学院这一独特的学术与社会旅程的标记时，这一个性显得尤为动人。

本项研究遵循时间顺序，按照莫斯生活的主要阶段分为四个部分：（1）涂尔干的外甥；（2）图腾和禁忌氏族；（3）继承人；（4）认可。结尾涉及二战及其后岁月。这本书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中还包括涂尔干和莫斯的通信集（与菲利普·贝纳尔合作）^[24]以及莫斯的政治论文集^[25]。很显然，在这本书里，我试图通过对莫斯的一生，简短来说，在人文科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的描述来概观莫斯的作品。通过这一方式，我们能对莫斯影响力的范围和宽广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一显著影响不仅体现在他所训练的一代研究者，像丹尼丝·波尔姆（Denise Paulme）、路易·迪蒙（Louis Dumont）、奥迪古以及其他学者身上，还体现在列维-斯特劳斯、贡多米纳斯和布迪厄身上，而这，不用说，还只是一小部分。

第一部分

涂尔干的外甥

大部分孩子都像他们的舅舅。

——犹太法典《塔木德》

埃皮纳勒、波尔多、巴黎

哪怕是在莫斯最初的岁月中，每个人都会自动地将他和涂尔干联系起来，莫斯的同学淘气地把涂尔干称为他的“舅舅”。就像亨利·莱维-布吕尔所言，涂尔干不仅是莫斯的老师，“极好的教授”，还是他母亲的兄弟。^[1]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莫斯将自己看成“外甥”并不时地提到“舅舅”、“涂尔干”或者仅仅写成“D.”。“舅舅还在教课……他看上去显得有些疲惫，他累了”；“舅舅现在好多了，但仍处于焦虑中”。基于血缘关系、学术联盟和共同工作之上的外甥和他的“好舅舅”之间的这一纽带是牢固的。

在“孚日”

与涂尔干一样，莫斯也出生于埃皮纳勒（Épinal）。他们之间相差十四岁：舅舅出生于1858年4月15日，外甥的生日则是1872年5月10日。莫斯的父亲热尔松（Gerson）于1834年出生于下莱茵省的阿唐，娶了涂尔干的姐姐、1848年出生于埃皮纳勒的罗西纳（Rosine）。这对夫妇定居于埃皮纳勒，有两个孩子：马塞尔·伊斯拉埃尔（Marcel Israël）和卡米耶·亨利（Camille Henri，生于1876年6月10日）。莫斯出生时，父亲三十七岁，母亲二十三岁。这个家庭的姓氏毫无疑问是德国姓氏。据说莫斯的一位曾祖父不希望他家背负一个